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辑

知青

——
渐行渐远的记忆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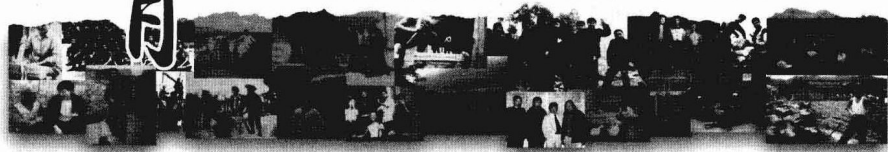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知青

—— 前行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

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编

送朱平兄

正。

钟钢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20-07743-2

I. 四… II. 四… III. ①文史资料—四川省②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史料—四川省 IV. K297.1 D4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777 号

•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 •

ZHIQING JIANXINGJIANYUAN DE JIYI

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谢 雪
文小牛
古 蓉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市海翔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338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7743-2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 1 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
——关于知识青年群体调查报告 袁诗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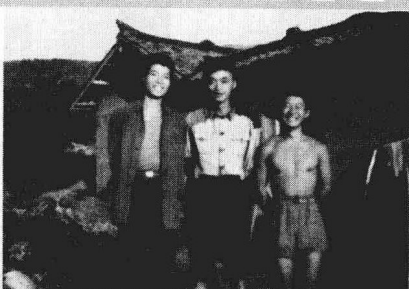
1966年以前

- 14 佘山杂忆
——云南边疆知青岁月片断 陈宏志
- 21 知青五记 万晓农
- 37 知青经历教我珍爱生活 高起植
- 42 我的知青岁月 周英玉
- 49 知青夫妻 杜修齐
- 59 三个出名的老知青 吕 帖
- 63 蓦然回首知青事 兰廷浩
- 71 九弯子 康大寿
- 78 东风园艺场知青生活纪实 孙光驹
- 87 “二黑” 章孟杰



1968 ~ 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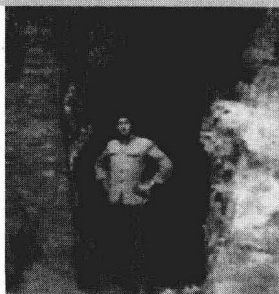
- 94 云南支边知青的回忆 杜志和
- 102 我的“汉阳造” 曲 博
- 108 阮党生 王晓梅
- 113 1979：云南支边知青大返城 杨 全
- 126 我的知青生涯 万郁文
- 135 知青生活二三事 姜益生
- 138 我在邛崃当“知哥” 郑光路
- 165 凄婉的歌 张治玲
- 174 大山情结 李 莉
- 177 人 祸 吉晓峰
- 183 难忘的知青岁月 施又麟
- 190 知青“王三” 惠 蜀
- 197 草根岁月 冯文广
- 206 “金生”——难忘的乡亲 尹德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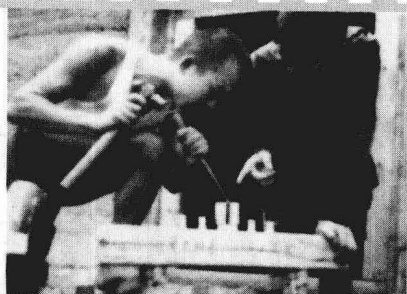
- 212 知青犹忆《洋菊花》 孙和平
- 215 知青日记 靳玉娥
- 220 知青期间难忘的几件事 刘小革
- 226 山区背夹 陈光荣
- 229 从彷徨到感悟 魏赤中
- 234 冲 突 李国友 魏光武
- 238 知青生涯铺就的音乐之路 熊光清

1973 ~ 1977年

- 242 知青的誓言 唐顺发
- 247 运交华盖
——在路线教育工作队入村前夕 杨吉成
- 250 泥香稻甜 钟 钢
- 257 青春流淌在剑门山
——我在四川剑阁县插队的岁月 许晓光



- 266 无奈的选择 意外的收获 甘绍成
- 270 “背水库” 屈刚
- 274 记忆
——1977年高考片段 聂卉
- 277 古溪沟往事 李砚
- 282 难忘的知青生活 包世根
- 287 曾经的知识青年队 刘小彦
- 291 青青果 余静
- 296 幺奶、幺爸、幺婶 雪子
- 300 知青生活回顾 李开忠
- 305 知青的苦与乐 芦献平
- 311 编后记



知青——渐行渐远的记忆

——关于知识青年群体调查报告

袁诗敏

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清晰记得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及其后的十年间，全国共有1680多万名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其中四川有65万城镇下乡知青）。这场运动造成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的结果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至今仍使当事人感到刻骨铭心。所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30年来，人们仍关注着那场运动，描述着那场运动，研究着那场运动，并一直成为文学界、艺术界、史学界表现和研究的对象。

一、知识青年：一代特殊群体

1. 城镇知青的界定

“知青”包括城镇知青和回乡知青两部分。其中，城镇知青主要是指1947~19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8~1978年上山下乡的1680多万名中学生和部分小学毕业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大约占了1.2亿中国城镇人口的14%左右。在上山下乡的十年里，知青人数占同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中的62%。他们是城镇同龄人中的大部分，是20世纪60~

70年代中国城镇人口中一个人数不小的重要群体。在1968~1972年第一波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有800多万人去了农村，其中4/5为农村插队知青，1/5为集体农场职工即农场知青。他们中一般以“老三届”（即“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初中学生为主体，也包括少量城镇高小生和城镇待业青年。在1973~1977年第二波上山下乡高潮中，城镇有约850万名青年去了农村，他们中以“文革”时期的高中生为主体。与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相比，由于国家规定了留城和下乡政策，情况有所变化，下乡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同时各级革委会及领导对安置下乡知青也更加重视。比如从1975年起，当时的四川省委领导同志每年都要过问知青工作，并连续两年召开知青工作会，研究解决知青遗留问题。市、地、州一级为贯彻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又层层召开有关会议，一直到县、公社一级。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城镇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相当数量的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之后，像邢燕子、董加耕等一大批农村学生因各种原因没能考上初中、高中、大学之后，回乡务农便成为他们主要的出路。尤其是1956年所有制改造和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随着户籍制度和以后的城市招工、粮棉油计划供应制度的强化，更堵死了农村知青合法滞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再有就是同样是知识青年，农村知青和城市知青也深深打上“二元结构”的印记，1968年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城镇知青如四川插队的知青尚有人均两百元的财政安置补助，回乡知青则只能两手空空回到“广阔天地”。在我们讲述的1968~1978年这一代知青之前还有过约129万“文革”前知青，在1957~1966年间下了乡或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中有像侯隽、孙传琪、巫方安那样献身农村的典范。但更多的却是在没有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上山下乡时间更长，经历更苦。但他们没有与“文革”中的知青一代相近的“文革”经历，当“文革”时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走向社会造反时，“文革”前的知青则是造反要求回城市。1966年末，成都市就曾出现过1964年下放到凉山的知青在繁华闹市区的几百人游

行，其口号也仅是：“我们要户口！我们要回城！”这两部分知青也没有相似的下乡后的道路历程，在招工、招生中，“文革”中的知青一代还能看到回城的希望，“文革”前的知青则甚至不敢产生这种念头，对他们而言，回城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知青典型

知青一代的人生观其实比较单纯，他们在读书期间接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学习的榜样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和董存瑞、具有共产主义风尚的雷锋、“文革”期间树立起来的英模人物刘英俊……这些榜样留给知青一代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革命教育使知青们愿意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有了性格的共性。比如闻名全国的知青先进典型侯隽、邢燕子、柴春泽、朱克家以及四川的孙传琪、巫方安等等。1963年7月10日，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正式将户口从北京迁到了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村。侯隽读书时的成绩非常好，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临考前放弃了高考下乡当农民。与侯隽同样怀有革命理想的四川知青典型有孙传琪和巫方安。孙传琪和巫方安都是成都城里的中学生，孙传琪在中学读书时成绩也非常好，并且在初中阶段就加入了共青团。1963年她们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分别下放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甘洛两县的高寒山寨，并很快成为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典型，其事迹于1965年在《四川日报》上刊载，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专门接见了她们。

与侯隽、邢燕子不同的是，“文革”中的广大知青到农村去并非自愿，其中包括当时红极一时的柴春泽、朱克家等等。朱克家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迫不得已下乡的。1969年4月，朱克家从上海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朱克家登上开往云南的火车时，看到母亲在月台上哭得昏倒在地时心里非常难受，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上海。柴春泽本来也不愿意下乡，他的志向是参军。但1968年因为他是“中学生的

典型”即校革委副主任，一些被动员下乡的毕业生说：“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在此情形下，柴春泽选择了下乡，来到内蒙古翁牛特旗玉田皋插队落户。下乡后的朱克家和柴春泽与千千万万知青一样，也作出过一些成绩，并有过一些扎根农村的举动，如朱克家放弃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独自在偏远的傈尼族山寨教书，为乡亲当裁缝、木匠和剃头匠。柴春泽则尝试在当地种水稻，并拒绝了父亲让他招工回城的催促。朱克家放弃上大学的事迹被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慰问团“相中”，由此进入姚文元的视野。姚马上派写作班子到云南，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农村也是大学》等通讯见诸报刊。一时间，典型就这样炼成了。2006年，有记者采访2004年已退休的朱克家时，朱克家讲：“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一辈子待在农村，当时却拔得那么高，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就只有接着干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二、知识青年：一个名不副实的群体

从1966年8月开始，全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被要求“停课闹革命”，“老三届”们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参加了“文革”运动。“文革”中，他们作为红卫兵，参与了“破四旧”、批斗老师、毁坏学校的教学设施、摧毁共和国正规教育秩序和“武斗”等活动。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复课”实际已没有可能。学校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旧的教学大纲已废除，除了政治性的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中央要求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革”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教科书等，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除高六六级学生外，其他同学拥有的只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老三届”走了，但“文革”对知识的鄙夷仍在学校中继续。1969

年，中央教育部门在批转一份农村教育的报告时，认可了农村中学只应设置五门主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学与艺术、军训、劳动。这种极左思潮指导下的学校课程设置不仅贬低了科学文化知识，更把农村青年的视野限制在“农业基础知识”上。中央教育部门更将这种教学设置作为中国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广，并在一段时间内设置了另一门主课：工业基础知识。这些“教育革命”措施的实施，使得“老三届”之后的大量中学生成为一个“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的群体。

1970年后，中学生曾一度有过接受所谓正规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开始的城市普及高中为正规教育提供了制度的基础，各省、市、自治区开始通过教科所、教研室编制正规教育的暂行教材。如1970年底，成都市即经成都市革委会主任孙洪道、副主任许梦侠批准，市革委财经组划拨两万元给当时的文教组，委托解子光、白敦仁等专家编制成都市中小学教育大纲。但这种正规化教育的努力，很快就因为“文革”极左思潮的干扰而成为泡影。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大专院校代表共630多人。经过长达100多天的听报告、学习和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个纪要中，除继续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体系以外，更提出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极左教育方针。

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极左的政治家们以招收“白卷英雄”张铁生入学而将手上长茧凌驾于知识之上；以支持和树立尚未懂事的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而将师生秩序摧毁；以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个女学生英语考试失败后自杀而对校长、老师惩罚致使教育规矩被打破。随之产生的后果是“田野”取代了课堂，“手上老茧”替代了升学入学考试。

三、知青中有幸走出来的6.76%

所谓“有幸”，是指十年“文革”中168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通过招生、考学而获得高等教育的那一部分人。由于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资料，只能估算得出结论。1970~1976年期间，中国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1976年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校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1976年知青入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就有23.6万人是来自农村的知青。但实际上知青在1973~1976年间上学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因为一些知青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上大学。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大约有30万人被推荐而进入了大学的校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19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或农场）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大学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1979年期间的三届大学生中大约有55.2万人当过知青。1979~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专科生；1980年教育部允许符合条件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颁发文凭后，函大和夜大在1980~1982年间共有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段为基础，那么1979~1982年期间的电大、函大、夜大等共计有53.03万学生，其中约有62%即32.88万人的年龄在20~23岁与30~36岁，即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内。基于知青曾是同期同龄城市学生总数的61%，那么匡算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大、函大、夜大的学生。工农兵学员制在1976年后终止，1980年起大学也从应届高中生中招考学生，而1982年后20岁上下的小青年成了电大、函大、夜大的主要学生。从1982年到90年代，虽然仍有少量知青在读电大、函大、夜大的大专班，但估计人数超不过10万人。可以这么匡算：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1979年的大学生，再加上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大专生，知青一代按宽松估计大约有115万人最终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除大约有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

中技校外，其余知青只能永远拥有残缺不全的学校教育，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79年以后，中央组织部开始把受教育程度作为提拔干部的一项参照标准。到1983年，中组部、国家人事部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选拔干部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一刀切”的干部政策，对改变当时干部结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并促使当时适龄干部、职工千方百计上电大、读党校，获取干部任职资格。而在这一转换中，知青一代不完整的教育或低水平的教育，使他们无法获得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相反，日益激烈的市场和人力资源竞争，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抛向了社会的底层。

四、知青：被耽误的一代

1. 就业时间被耽误

不少知青从农村回城时已近30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即使1977年开始的高考让一部分人搭上通往大学的末班车，可他们受教育的最佳时段已被耽误了。当30岁的老知青和18岁的应届高中生同坐在大学的教室时，其明显的不对称性，提示知青一代要赶上改革时代的步伐将付出加倍的努力。

上山下乡使大部分知青的社会生活被耽误了五年以上。在1680多万知青中，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甚至更长。成都十六中一名高二的冉姓同学，下乡时就比大多数同学大两岁，22岁，其父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上将属下的中将师长，曾率部出川抗日。只因其父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官，致使冉同学在乡下待了十年之久，被招回成都某服装厂时已是32岁大龄。据资料统计，在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接近尾声时，农村仍有几百万知青。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下乡达十年之久，特别是200多万待在已由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可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从下去的第一天起，兵团知青就已经是国家职

工，因此他们很少能以“招工”这一形式上调回城。而作为“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以及“文革”中揪出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无希望上调回城的一族。说他们“可以教育好”，也许是给他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机会，而农村广阔天地恰恰是教育这些人的最佳环境。总的说来，不论下乡的时间长短，许多知青20多到30岁左右招工回城，拿到每月20元左右的学徒工资时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

不幸的是，许多知青返城之后仍然没有就业的机会。除父母所在的一些国营企业按上级的要求安置了符合规定的返城知青外，多数知青仍然难以在城市就业。1979年，为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的素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国营、集体企业招工必须进行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样一来，丢书本多年或本身教育素质就不高的返城知青只好降格以求，到文化知识要求相对不高的环卫、饮食、殡葬以及街道、里弄企业从事粗、笨、脏、累的工作。

2. 恋爱、婚姻被耽误

无论是对下乡感到岁月蹉跎还是青春无悔，对于大部分知青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恋爱生活肯定被耽误了。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以及家长、领导的劝阻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情说爱。拖到20多岁时，虽然青春期有追求异性的冲动，但因为由此可能付出永远留在农村的代价，而阻止了他们对异性的追求。因为虽然国家没有法律和政策规定不准知青谈恋爱，但招工、招生、招兵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招已婚的知青。由于这种政策导向，使得许多知青回城时仍然是单身，或已超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1977年，黑龙江省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倡导的男28岁、女25岁的晚婚年龄；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的人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在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当上世纪80年代初知青回城时，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大龄单身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待在农村耽误了婚嫁的最佳年龄段。据资料介绍，1983年，上海有12万30~39岁的未婚“青年”，北

京有30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有40%是返城知青。而回城知青中“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引人注目，如成都市1965年青少年乒乓球单打亚军张某原本是个漂亮的青春少女，由于下乡耽误了青春年华，回城时已错过恋爱季节，加之本人又不愿低就，致使她迄今仍孑然一身。

没有经历过恋爱阶段的知青缺乏生活的浪漫和“两人世界”的情趣，众多结了婚的知青婚后生活也缺少幸福。除少数人的婚姻是因爱而结合外，更多人都是对回城的遥遥无期感到绝望或难以忍受农村的艰辛而找一个相依的伴侣而草率结合的。当时知青与知青或知青与农民的婚姻，可以说多数是因为对回城无望而草率结合的婚姻，感情基础当然是十分脆弱的。当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大返城时，这些结了婚的知青也一同往城里挤，不少已婚的知青家庭便被这返城大潮冲成碎片，在云南勐定、腾冲、西双版纳的农场中，还发生过史无前例的五天内2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没有离婚的知青回了城并不意味着婚姻可以“保鲜”而不发生蜕变。当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时，回城知青的离婚案迅速增加。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杂志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做过调查后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离婚，其中包括知青与其农村的配偶离婚（离婚率达90%以上）；另外也包括知青夫妇离婚，其离婚理由大多为“婚前感情基础缺乏”！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的家庭不幸和社会问题，产生了许多“孽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婚姻道德的大讨论。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城市知青因种种原因没有与农村配偶离婚而永远滞留在乡下。1998年底，央视曾报道过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的婚姻悲剧；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过因婚姻而留在吉林省乡下的上百名上海“留乡知青”，只有这些知青的上海口音，才提醒着代表团成员：他们也曾是“上海人”。

3. 亲情的移位

知青在农村落户多年突然返城，多少使城市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始料不及。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的大回流，更“扰乱”了城市亲人们的正常生活。返城知青顿时挤爆了城市的公交车，挤烦了当地的